

出版前言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对外开放、信息技术发展、语言产业繁荣与教育领域改革等对我国外语教育发展和外语学科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有力推动了我国外语学术出版事业的发展。为梳理学科发展脉络，展现前沿研究成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汇聚国内外语学界各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精心策划了“外语学科核心话题前沿研究文库”（下文简称“文库”）。

“文库”精选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翻译学、外国文学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五大方向共25个重要领域100余个核心话题，按一个话题一本书撰写。每本书深入探讨该话题在国内外的研究脉络、研究方法和前沿成果，精选经典研究及原创研究案例，并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展望。“文库”在整体上具有学术性、体系性、前沿性与引领性，力求做到点面结合、经典与创新结合、国外与国内结合，既有全面的宏观视野，又有深入的细致分析。

“文库”邀请国内外语学科各方向的众多专家学者担任总主编、子系列主编和作者，经三年协力组织与精心写作，自2018年底陆续推出。“文库”已获批“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作为一个开放性大型书系，将在未来数年内持续出版。我们计划对这套书目进行不定期修订，使之成为外语学科的经典著作。

我们希望“文库”能够为外语学科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生、教师及研究者提供有益参考，帮助读者清晰、全面地了解各核心话题的发展脉络，并有望开展更深入的研究。期待“文库”为我国外语学科研究的创新发展与成果传播作出更多积极贡献。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年11月

“外语学科核心话题前沿研究文库”学术委员会

主任：孙有中 王文斌 王克非 文秋芳 张 剑
委员：蔡金亭 陈 红 刁克利 董燕萍 高一虹 韩宝成
黄立波 蒋 严 马秋武 秦洪武 司富珍 谭惠娟
王东风 王立非 徐 浩 许家金 许 钧 杨金才
袁毓林 张 辉 张 威 朱 磊

“外国文学研究核心话题系列丛书”编委会

总主编：张 剑

传统·现代性·后现代研究系列主编：张 剑

社会·历史研究系列主编：杨金才

种族·后殖民研究系列主编：谭惠娟

自然·性别研究系列主编：陈 红

心理分析·伦理研究系列主编：刁克利

目录

总序	张 剑	ix
前言	胡亚敏	xviii
第一章 概说		1
<hr/>		
1.1 中国战争文学概述		7
1.2 西方战争文学概述		11
1.3 亚非战争文学概述		19
1.4 战争文学研究的当代意义		28
第二章 渊源与发展		33
<hr/>		
2.1 中国古代战争伦理与战争文学		34
2.1.1 “军礼”的起源与规约		34
2.1.2 先秦对战争伦理的论争		39
2.1.3 战争伦理与中国古代战争小说		43
2.2 西方正义战争论与战争文学		46
2.2.1 正义战争的起源与规约		47
2.2.2 正义战争论与美国战争文学		56
2.3 单独媾和的溯源与困境		60
2.3.1 单独媾和的文化溯源		61
2.3.2 单独媾和的困境		72
2.4 印度两大史诗中的战争与民族精神		81

2.4.1 战争与正法·····	83
2.4.2 战争与业力·····	85
2.4.3 战争与种姓·····	87

第三章 经典专题分析

91

3.1 战争与媒体·····	91
3.1.1 意识形态与战争宣传·····	92
3.1.2 影视文化的影响与观众期待·····	99
3.1.3 媒体与公众的共谋关系·····	106
3.2 战争、创伤与身份认同·····	114
3.2.1 《部落：论回家与归属》中的战争创伤与身份认同··	116
3.2.2 美国老兵的战争创伤与身份认同危机·····	124
3.3 战争、种族与民族·····	129
3.3.1 黑人的战争经历与民族建构·····	130
3.3.2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黑人书写·····	133
3.3.3 美国内战时期的黑人战争书写·····	136
3.3.4 美西、美菲战争时期的黑人战争书写·····	140
3.3.5 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黑人战争书写·····	142
3.3.6 越战时期及以后的黑人战争书写·····	144
3.4 战争、科技与民族身份·····	149
3.4.1 科技与美国荒野的结合·····	151
3.4.2 科技与美国精神的结合·····	154
3.4.3 高科技武器与美国精神的式微·····	159
3.4.4 高科技战争对荒野理想的背离·····	163

第四章 原创案例分析 168

- 4.1 《追寻卡西艾托》中的叙事时间与战争创伤····· 169
- 4.1.1 时序：对战争经历的倒错叙事····· 170
- 4.1.2 时频：对比利·博伊之死的重复叙事····· 177
- 4.1.3 时距：对马丁中尉之死的省略叙事····· 181
- 4.2 《巴格达的弗兰肯斯坦》：“后9·11小说”的伦理维度·185
- 4.2.1 当他者的身体成为自己的身体····· 188
- 4.2.2 当他者的历史成为自己的历史····· 191
- 4.2.3 当他者的名字成为自己的名字····· 193

第五章 研究现状与趋势 199

- 5.1 国家社科基金与战争文学研究现状····· 201
- 5.1.1 立项总体情况····· 202
- 5.1.2 外国战争文学研究范围····· 207
- 5.1.3 研究视角····· 209
- 5.2 战争文学研究趋势····· 214

参考文献 220

推荐文献 234

索引 236

总序

外国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作品译介时代、文学史研究时代和作家+作品研究时代，如果查阅申丹和王邦维主编的《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别是在九十年代以后，外国文学研究进入了文学理论研究时代。译介外国文学理论的系列丛书大量出版，如“知识分子图书馆”系列和“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系列等。在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堂使用较多、影响较大的教程中，中文的有朱立元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英文的有张中载等主编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和朱刚主编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这些书籍所介绍的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理论，以《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为例，包括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原型批评、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等。

经过十多年之后，这些理论大多已经被我国的学者消化、吸收，并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广泛应用。有人说，外国文学研究已经离不开理论，离开了理论的批评是不专业、不深刻的印象主义式批评。这话正确与否，我们不予评论，但它至少让我们了解到理论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在大多数外国文学研究者心中的分量。许多学术期刊在接受论文时，首先看它的理论，然后看它的研究方法。如果没有通过这两关，那么退稿即是自然

的结果。在学位论文的评阅中，评阅专家同样也会看这两个方面，并且把它们视为论文是否合格的必要条件。这些都促成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理论时代的到来。我们应该承认，中国读者可能有理论消化不良的问题，可能有唯理论马首是瞻的问题。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在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中，理论和概念可能会被生搬硬套地强加于作品，导致“两张皮”的问题。但是，总体上讲，理论研究时代的到来是一个进步，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探索和追寻的方向。

—

如果说“应用性”是我们这套“外国文学研究核心话题系列丛书”（以下简称“丛书”）追求的目标，那么我们应该仔细考虑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应该如何强化理论的运用，它的路径和方法何在？第二，我们在运用西方理论的过程中如何体现中国学者的创造性，如何体现中国学者的视角？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十年前，当人们谈论文学理论时，最可能涉及的是某一个宏大的领域，如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等。而现在，人们更加关注的不是这些大概念，而是它们下面的小概念，或者微观概念，比如互文性、主体性、公共领域、异化、身份等等。原因是大概念往往涉及一个领域或者一个方向，它们背后往往包涵许多思想和观点，在实际操作中有尾大不掉的感觉。相反，微观概念在文本解读过程中往往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在分析作品时能帮助人们看到更多的意义，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人物、情节、情景，以及这些因素背后的历史、文化、政治、性别缘由。

在英国浪漫派诗歌研究中，这种批评的实例比比皆是。比如莫德·鲍德金（Maud Bodkin）的《诗中的原型模式：想象的心理学研究》（*Archetypal Patterns in Poetry: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Imagination*）就是运用荣格（Carl Jung）的原型理论对英国诗歌传统中出现的模式、叙事结构、人物类型等进行分析。在荣格的理论中，“原型”指古代神话中出

现的某些结构因素，它们已经扎根于西方的集体无意识，在从古至今的西方文学和仪式中不断出现。想象作品的原型能够唤醒沉淀在读者无意识中的原型记忆，使他们对此作品作出相应的反应。鲍德金在书中特别探讨了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的《古水手吟》(*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中的“重生”和《忽必烈汗》(*Kubla Khan*) 中的“天堂地狱”等叙事结构原型 (Bodkin: 26-89)，认为这些模式、结构、类型在诗歌作品中的出现不是偶然，而是自古以来沉淀在西方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在具体文学作品中的呈现 (90-114)。同时她也认为，不但作者在创作时毫无意识地重现原型，而且这些作品对读者的吸引也与集体无意识有关，他们不由自主地对这些原型作出了反应。

在后来的著作中，使用微观概念来分析具体文学作品的趋势就更加明显。大卫·辛普森 (David Simpson) 的《华兹华斯的历史想象：错位的诗歌》(*Wordsworth's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he Poetry of Displacement*) 显然运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它凸显的关键词是“历史”，即用社会历史视角来解读威廉·华兹华斯 (William Wordsworth)。在“绪论”中，辛普森批评文学界传统上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对立，将华兹华斯所追寻的“孤独”和“自然”划归到私人领域。实际上，他认为华氏的“孤独”有其“社会”和“历史”层面的含义 (Simpson: 1-4)。辛普森使用了湖区的档案，重建了湖区的真实历史，认为这个地方并不是华兹华斯的逃避场所。在湖区，华氏理想中的农耕社会及其特有的生产方式正在消失。圈地运动改变了家庭式的小生产模式，造成一部分农民与土地分离，也造成了华兹华斯所描写的贫穷和异化。华兹华斯所描写的个人与自然的分离以及想象力的丧失，似乎都与这些社会的变化和转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84-89)。在具体文本分析中，历史、公共领域、生产模式、异化等概念要比笼统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更加有用，更能产生分析效果。

奈杰尔·里斯克 (Nigel Leask) 的《英国浪漫主义作家与东方：帝国焦虑》(*British Romantic Writers and the East: Anxieties of Empire*) 探讨了拜

伦 (George Gordon Byron) 的“东方故事诗”中所呈现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 雪莱 (Percy Bysshe Shelley) 的《阿拉斯特》(*Alastor*) 和《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 中所呈现的印度, 以及托马斯·德·昆西 (Thomas De Quincey) 的《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 中所呈现的东亚地区的形象。他所使用的理论显然是后殖民理论, 但是全书建构观点的关键概念“焦虑”来自心理学。在心理分析理论中, “焦虑”常常指一种“不安”“不确定”“忧虑”和“混乱”的心理状态, 伴随着强烈的“痛苦”和“被搅扰”的感觉。里斯克认为, 拜伦等人对大英帝国在东方进行的帝国事业持有既反对又支持、时而反对时而支持的复杂心态, 因此他们的态度中存在着焦虑感 (Leask: 2-3)。同时, 他也把“焦虑”概念用于描述英国人对大英帝国征服地区的人们的态度, 即他们因这些东方“他者”对欧洲自我“同一性”的威胁而焦虑。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批评实践, 是用批评理论进行文本分析, 那么拉曼·塞尔登 (Raman Selden) 的《实践理论与阅读文学》(*Practicing Theory and Reading Literature*) 一书值得我们参考借鉴。该书是他先前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的后续作品, 主要是为先前的著作所介绍的批评理论提供一些实际运用的方法和路径, 或者实际操作的范例。在他的范例中, 他凸显了不同理论的关键词, 如关于新批评, 他凸显了“张力”“含混”和“矛盾态度”; 关于俄国形式主义, 他凸显了“陌生化”; 关于结构主义, 他凸显了“二元对立”“叙事语法”和“比喻与换喻”; 关于后结构主义, 他凸显了意义、主体、身份的“不确定性”; 关于新历史主义, 他凸显了主导文化的“遏制”作用;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 他凸显了“意识形态”和“狂欢”。

虽然上述系列并不全面,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概念的数量和种类都可能要超过它, 但是它给我们的启示是: 要进行实际的批评实践, 我们必须关注各个批评派别的具体操作方法, 以及它们所使用的具体路径和工具。我们这套“丛书”所凸显的也是“概念”或者“核心话题”, 就是为了

实际操作，为了文本分析。“丛书”所撰写的“核心话题”共分5个子系列，即“传统·现代性·后现代研究”“社会·历史研究”“种族·后殖民研究”“自然·性别研究”“心理分析·伦理研究”，每个子系列选择3-5个最核心的话题，分别撰写成一本书，探讨该话题在国内外的研究脉络、发展演变、经典及原创研究案例等等。通过把这些概念运用于文本分析，达到介绍该批评派别的目的，同时也希望展示这些话题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的作用。

二

中国的视角和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和超越，是长期困扰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的问题，这不是一套书或者一个人能够解决的。外国文学研究界，特别是专注外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有人甚至批评说，国内研究外国文学理论的人好像有很大的学问，其实仅仅就是“二传手”或者“搬运工”，把西方的东西拿来转述一遍。国内文艺理论界普遍存在着“失语症”。这些批评应该说都有一定的道理，它警醒我们在理论建构方面不能无所作为，不能仅仅满足于译介西方的东西。但是“失语症”的原因究竟是因为我们缺少话语权，还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话语？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

我们都知道，李泽厚是较早受到西方关注的中国现当代本土文艺理论家。在美国权威的文学理论教材《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第二版中，李泽厚的《美学四讲》(*Four Essays on Aesthetics*)中的“形式层与原始积淀”(“*The Stratification of Form and Primitive Sedimentation*”)成功入选。这说明中国文艺理论在创新方面并不是没有话语，而是可能缺少话语权。概念化和理论化是新理论创立必不可少的过程，应该说老一辈学者王国维、朱光潜、钱钟书对“意境”的表述是可以概念化和理论化的；更近时期的学者叶维廉和张隆溪对道家思想在比较文学中的应用也是可以概念化和理论化

的。后两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要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可能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提升，可能也需要中国的学者群体共同努力，去支持、跟进、推动、应用和发挥，以使它们产生应有的影响。

在翻译理论方面，我国的理论创新应该说早于西方。中国是翻译大国，二十世纪是我国翻译活动最活跃的时代，出现了林纾、傅雷、卞之琳、朱生豪等翻译大家，在翻译西方文学和科学著作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中国翻译家提出“信达雅”的时候，西方的翻译理论还未有多少发展。但是西方的学术界和理论界特别擅长把思想概念化和理论化，因此有后来居上的态势。但是如果仔细审视，西方的热门翻译理论概念如“对等”“归化和异化”“明晰化”等等，都没有逃出“信达雅”的范畴。新理论的创立不仅需要新思想，而且还需要一个整理、归纳和升华的过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概念化和理论化。曹顺庆教授在比较文学领域提出的“变异学”就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我个人认为，它有可能成为中国学者的另一个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是一件重要而艰难的事情，最难的创新莫过于思维范式的创新，也就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所说的范式(paradigm)的改变。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的“日心说”是对传统的和基督教的宇宙观的全面颠覆，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论”是对基督教的“存在的大链条”和“创世说”的全面颠覆，康德(Immanuel Kant)的“唯心主义”学说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全面颠覆。这样的范式创新有可能完全推翻以前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从而建立一套新的知识体系。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中将“范式”称为“范型”或“型构”(episteme)，他认为这些“型构”是一个时代知识生产与话语生产的基础，也是判断这些知识和话语正确或错误的基础(Foucault: xxi-xxiii)。能够改变这种“范式”或“型构”的理论应该就是创新性足够强大的理论。

任何创新都要从整理传统和阅读前人开始，用牛顿(Isaac Newton)的话来说，就是“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远一些，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福柯曾经提出了“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的概念，用来分析个人在权利监视下的困境，在国内的学位论文中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但是这个概念来自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福柯还提出了一个“异托邦”(heterotopia)的概念，用来分析文化差异和思维模式的差异，在中国的学术界也很有知名度，但这个概念是由“乌托邦”(utopia)的概念演化而来，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Plato)和十六世纪的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对“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分析曾经对女性主义和文化批评产生过很大影响，但是它也是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心理分析的改造，可以说是后结构主义语言观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巧妙结合。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政治无意识”(political unconscious)概念常常被运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中，但是它也是对马克思(Karl Marx)和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ideology)理论的发展，可以说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和心理分析的巧妙结合。甚至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两个标志性概念“颠覆”(subversion)和“遏制”(containment)也是来自别处，很有可能来自福柯、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或其他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虽然对于我们的时代来说，西方文论的消化和吸收的高峰期已经结束，但对于个人来说，消化和吸收是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

在经济和科技领域也一样，人们也是首先学习、消化和吸收，然后再争取创新和超越，这就是所谓的“弯道超车”。高铁最初不是中国的发明，但是中国通过消化和吸收高铁技术，拓展和革新了这项技术，使我们在应用方面达到了世界前列。同样，中国将互联网技术应用延伸至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线上支付等领域，使中国在金融创新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这

就是说，创新有多个层面、多个内涵。可以说，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证据创新、应用创新都是创新。从0到1的创新，或者说从无到有的创新，是最艰难的创新，而从1到2或者从2到3的创新相对容易一些。

我们这套“丛书”也是从消化和吸收开始，兼具**学术性、应用性**：每一本书都是对一个核心话题的理解，既是理论阐释，也是研究方法指南。“丛书”中的每一本基本都遵循如下结构。1) 概说：话题的选择理由、话题的定义(除权威解释外可以包含作者自己的阐释)、话题的当代意义。如果是跨学科话题，还需注重与其他学科理解上的区分。2) 渊源与发展：梳理话题的渊源、历史、发展及变化。作者可以以历史阶段作为分期，也可以以重要思想家作为节点，对整个话题进行阐释。3) 案例一：经典研究案例评析，精选1-2个已有研究案例，并加以点评分析。案例二：原创分析案例。4) 选题建议、趋势展望：提供以该话题视角可能展开的研究选题，同时对该话题的研究趋势进行展望。

“丛书”还兼具**普及性和原创性**：作为研究性综述，“丛书”的每一本都是在一定高度上对某一核心话题的普及，同时也是对该话题的深层次理解。原创案例分析、未来研究选题的建议与展望等都具有原创性。虽然这种原创性只是应用方面的原创，但是它是理论创新的基础。“丛书”旨在增强研究生和年轻学者对核心话题的理解和应用能力，进一步扩大知识分子的学术视野。“丛书”的出版是连续性的，不指望一次性出齐，随着时间的推移，数量会逐渐上升，最终在规模上和质量上都将成为核心话题研究的必读图书，从而打造出一套外国文学研究经典。

“丛书”的话题将凸显**文学性**：为保证“丛书”成为文学研究核心话题丛书，话题主要集中在文学研究领域。如果有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领域话题入选，那么它们必须在文学研究领域有相当大的应用价值；对于跨学科话题，必须从文学的视角进行阐释，其原创案例对象应是文学素材。

“丛书”的子系列设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分类常常有一定的难度，常常有难以界定的情况、跨学科的情况、跨类别的情况，但考虑到项目定

位和读者期望，对“丛书”进行分类具有相当大的必要性，且要求所分类别具有一定体系，分类依据也有合理解释。

在西方，著名的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经陆续出版过一套名为“新声音”（New Accents）的西方文论丛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个系列一直延续了二十多年，出版了上百种书籍，至今还在延续。我们这套“丛书”也希望能够以不断积累、不断摸索和创新的方式，为中国学者提供一个发展平台，让优秀的思想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呈现和发展，发出中国的声音。“丛书”希望为打造中国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派别、展示中国的视角和观点贡献自己的力量。

张剑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8年10月

参考文献

- Bodkin, Maud. *Archetypal Patterns in Poetry: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Imagin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 Foucault, Michel.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0.
- Leask, Nigel. *British Romantic Writers and the East: Anxieties of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Simpson, David. *Wordsworth's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he Poetry of Displacement*. New York: Methuen, 1987.

前言

战争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又与人类文明和历史息息相关。人类从远古时期一路走来，战争就如同一个幽灵，与人类如影随行。人类对历史和文化的书写无不显现出战争的印迹和影响。战争文学生动记载了战争带给人类的伤害和灾难，描摹了遭受战争蹂躏的人们在黑暗中的苦痛和挣扎，刻画了人类在毁灭和绝望中迸发出的呐喊和勇气，展示了普通人在战争中的坚韧、温柔和善良。

人类在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就已经大量涉及战争话题。无论是中国的《诗经》、希腊的《荷马史诗》，还是印度的史诗，都对战争进行了描述和思考。在被迫与战争同行的过程中，人类也在不断地思考战争的性质。中国商周时期就有对行军打仗时“军礼”的规范，早期史书和诸子百家学说都对战争伦理展开了严肃的论争。西方的正义战争学说同样源远流长。《圣经》首先开始了对战争正义性的讨论，而后经中世纪神学家和近代法学家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正义战争论，对各国的战争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战争文学中的一些重要主题可以追溯到早期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这些思想以各种方式对卷入战争的国家产生影响，塑造了其战争观乃至民族文化。例如，被传诵了上千年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就生动说明，即使在两千多年后，早期战争文学中展现的民族精神依然在印度社会中有着重要影响。

战争文学与许多重要论题密切相关，如创伤、伦理、政治、身份、族裔、女性、科技、生态等。本书选取当前战争文学研究的重要论题，分“战争与媒体”“战争、创伤与身份认同”“战争、种族与民族”和“战争、科技与民族身份”四个专题加以论述，以期从不同维度加深对战争文学的理解。战争与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战时宣传密切相关，媒体常常通过影视作品和新闻报道等形式影响和塑造人们的战争观，起到推动或阻碍战争进行的作用。战争与创伤也是一个常为学界关注的论题。卷入战争的军人和平民遭受了深重的创伤，而战争创伤的产生实则与人们对个人和民族的身份认同息息相关。十九世纪是现代民族国家逐渐建立的时期。现代战争通常会构建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但这种叙事会掩盖民族国家内部人们对种族、性别、阶级等亚身份的追求。美国黑人战争文学描述了黑人期望通过战争获得种族上的平等、走进美国民族空间的不懈努力，生动体现了民族国家宏大叙事下的种族矛盾。在现代战争中，科技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的高科技武器装备无疑会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但科技却并非无所不能。在战争中大量运用高科技武器装备的美军并非百战百胜，有时高科技武器装备反而使美军遭遇惨败，同时还会使美军士兵质疑美国的民族身份。

第四章“原创案例分析”结合上一章论述的经典专题，选取两部小说分析战争文学如何表现相关主题。美国越战小说《追寻卡西艾托》(*Going After Cacciato*)里的混乱叙事和对时间的离奇运用，揭示了战争给美军士兵带来的思维上的困惑和情感上的创伤。伊拉克作家艾哈迈德·萨达维(Ahmed Saadawi)的《巴格达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in Baghdad*)则通过书写二十一世纪的伊拉克战争，从伊拉克平民的视角思考了战争伦理和对他的责任。

多位老师也参与了本书的写作，其中：

闫元元完成“2.4 印度两大史诗中的战争与民族精神”。

夏辉完成“4.2《巴格达的弗兰肯斯坦》：‘后9·11小说’的伦理维度”。

陈春华、胡亚敏共同完成“2.2.1正义战争的起源与规约”与“3.1.3媒体与公众的共谋关系”。

其他部分由胡亚敏完成。

在成书过程中，考虑到战争文学的世界性和历史性，我们尽量对东方与西方、古代与当代的战争文学都加以论述，争取全面地展现战争文学的现状。但由于作者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所限，本书选取的文本和例证以美国的战争文学作品为主。因此，相关论述可能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希望在将来的研究中，能够联合更多有不同知识结构和语言背景的学者一起攻研，对战争文学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的研究。

古今中外的战争文学作品述说着一个永恒的话题：战争使人类陷入黑暗，却擦亮了每个人的双眼，让我们去寻找光明。只要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还在，只要每个人心中对光明的渴望不变，人类就还有希望，就能在战争的废墟中听到和平的呼唤，感受到人性的真善美，体会到人生的意义。战争文学展现的虽然是残酷与灾难，吟唱的却是和平与人性。只要每个人心中的爱永在、光不灭，我们就能相互照亮，携手走出战争的黑暗。

胡亚敏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

2020年7月

概说

《孙子兵法》开篇即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¹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战争与人类生活休戚相关。有学者指出，从公元前三千年到公元二十世纪，世界上共发生上万次战争，完全和平的年代寥寥无几（曾建华：1）。可以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战争是人类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部分，也是各国文学的重要主题，很多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经典。

战争文学描述了战争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展现民众对战争的态度，反映人们对战争的思考。然而，关于“战争文学”的定义，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战争，二是战争文学是否应包括反映平民经历的作品。

在2018年出版的《劳特利奇美国战争文学概论》（*The Routledge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War Literature*）一书中，珍妮弗·海托克（Jennifer Haytock）指出，该书所讨论的“战争文学”一词中的“战争”，主要基于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战争论》（*On War*）一书中的定义，即“在至少两个具有相冲突目标的国家之间展开的、用以决出结果的暴力部署”（Haytock：15）。据此，海托克认为战争不应

1 语出《孙子兵法·始计》。

涵盖冷战和反恐战争等语境，也不包括种族屠杀中涉及的暴力场景。

《想象伊拉克：英语文学与入侵伊拉克》(*Imagining Iraq: Literature in English and the Iraq Invasion*)一书指出，美伊之间于2003年发生的军事冲突很难被称为战争。根据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定义，如果要把武装冲突定义为“战争”，则双方需要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卷入冲突的同等意愿、基本相当的作战实力”(Gupta: 19)。美国和伊拉克的实力过于悬殊，因此，休曼·格普塔(Suman Gupta)将美伊军事冲突称为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而非战争。

上述对“战争”的定义主要基于克劳塞维茨于1832年出版的《战争论》一书，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忽视了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战争呈现出的一些新特点。种族屠杀通常是战争的导火索或后果，与战争密切相关，因此可将之归入战争的范畴。例如，我们很难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与二战相分离。关于“战争”的定义，克劳塞维茨有两个非常核心而精辟的论断：一是“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克劳塞维茨：7-8)；二是“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25)。尽管冷战和反恐战争与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有所不同，但它们实际上都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都采用暴力或暴力威慑手段以迫使敌人服从其意志。冷战和反恐战争中的双方可能会更多地采取武力威慑的手段，也可能实力悬殊，但这些冲突都体现了历史发展新阶段中战争的新特点；而这些新特点在当前和未来的战争中可能会持续存在，未来的战争也还将涌现出更多新的特点。

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当前战争的新发展，并将之纳入研究范围。《爱丁堡二十世纪英美战争文学指南》(*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Twentieth-Century British and American War Literature*)将“去殖民化冲突和冷战”视为“关键的新研究领域，与当代英美战争文化有特别的关联”(Piette & Rawlinson: 1)，并以专章对冷战和大屠杀文学进行了分析。《剑桥战争书写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ar Writing*)也专辟一章讨论了“冷战与反恐战争”(McLoughlin: 239)。

克里斯托弗·科克尔 (Christopher Coker) 在《战争的未来：二十一世纪战争的复魅》(*The Future of War: The Re-Enchantment of Wa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一书中指出, 尽管无论在体制层面还是文化层面, “战争作为一种本体论现象已经终结” (Coker: xi), 但现代社会的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和生命技术革命给战争的形态带来了巨大变化, “为战争赋予了一种新的生命” (xii)。我们对战争文学的研究, 也应密切关注文学作品如何呈现这些“新型”战争及其带给人类的新的冲击。鉴于此, 本书倾向于对“战争”下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 不仅包括传统形态的战争, 也包括新型的冷战、反恐战争和伴随战争而来的种族屠杀。

争议的另一个焦点在于战争文学是否包括反映平民经历的作品。有的学者认为, 战争文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狭义的战争文学主要展现前线的战斗和军人的生活; 而广义的战争文学还应包括以战争为背景, 展现知识分子、小市民和其他普通人的生活遭遇和心灵创伤的作品 (林凌: 45-46)。

英国学者彼得·埃辛格 (Peter Aichinger) 为战争小说 (war novel) 下了一个比较宽泛的定义。在其博士论文《小说中的美国士兵: 1880—1963年间小说中美国人对战争和军事机构的态度史论》(“The American Soldier in Fiction: A History of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Warfare and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n the Novels Written Between 1880 and 1963”)里, 埃辛格认为, 战争小说指“任何一个长篇散文虚构作品, 作品中的人物的生命与行动主要受到战争或军事机构的影响” (Aichinger: ix)。埃辛格指出, 根据这一定义, 虽然 e. e. 卡明斯 (e. e. cummings) 的小说《巨大的房间》(*The Enormous Room*) 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平民, 但完全可以被看作一部战争小说; 而卡森·麦卡勒斯 (Carson McCullers) 的小说《金色眼睛的映像》(*Reflections in a Golden Eye*) 虽然主要人物均是军人及其家属, 故事也发生在美军的驻扎地, 但它关注的是军人的情感生活, 因而难以被称为战争小说。埃辛格对战争小说的定义强调战争及军事

行动对小说人物的影响，而不强调小说中的人物是否具有军人身份。

在《美国战争小说史论》中，李公昭认为埃辛格的定义过于宽泛。李公昭认为战争小说有三个基本要件：战争背景、战争人员、战争行为。战争小说应“主要表现战争期间的战斗场面与军人活动”，也“表现战争期间在后方从事与军事行动相关活动，或直接受战争影响的各类人员”（李公昭，2012：3）。这一定义强调小说人物的身份，或是参战人员，或从事与战争相关的工作，因而把描绘战争中平民经历的文学作品排除在战争文学之外。

中国现代战争文学研究中，“常常是‘军事文学’和‘军旅文学’乃至‘战争文学’（多是针对纯粹战争题材作品而言）三种提法交叉并用”（朱向前：1）。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量文学作品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为题材，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战争文学的繁荣期，将相关作品称为“战争文学”也名副其实。八十年代后，年轻一代的作家开始崛起，他们大都没有战争经历，作品更多是描写和平时期的军旅生活。这些作品通常被称为“军事题材文学”或“军事文学”。可以看出，除战争题材外，军事文学也描写“非战争状态下军营的日常生活和军人的军旅生涯”（3）。九十年代以后，“军旅文学”的概念开始出现，其题材范围与军事文学基本相同。军旅文学的主旋律是“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6），充分展现了新时期中国军人的精神面貌。由此可见，在中国战争文学研究的语境中，“战争文学”范畴的界定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而“军旅文学”是转入和平时期后对“战争文学”的补充，这一术语一般只在中国文学学界使用。两者构成了中国文学学界所研究的“军事题材文学”，或者说“军事文学”。

与之相对，在国外的军事题材文学和研究中，军旅文学这一概念可能并不适用，而军事文学与战争文学这两个术语的关系也与国内学界有所不同。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军事文学指以军事活动和军人生活为背景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可能以战时为故事背景，也可能描写和平时期的军队

生活。在《武装的美国：小说中的形象——美国军事小说史》(An Armed America: Its Face in Fiction—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Military Novel)一书中，韦恩·查尔斯·米勒(Wayne Charles Miller)从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反映和平时期美国海军护卫舰上船员生活的小说《白外套，或军舰上的世界》(White Jacket or, the World in a Man-of-War)开始谈起，通过分析众多相关的“军事小说”，着重探讨了美国的“军事结构”和“军事思想”产生的影响(Miller: xiii)。战争文学研究则更多地聚焦战时或战后的军队和军人，诸如《红色英勇勋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和《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等就是经常被研究的作品。这些作品注重探讨战争中军队的行动以及战争对士兵个人及其家人的冲击，尤其注重从创伤研究的角度讨论士兵战时和战后遭受的创伤；或探讨军队作为国家的缩影在战争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战争对平民的影响。对于没有参战的平民来说，战争同样真真切切地存在，也同样给他们带来深重的灾难和苦涩的回忆。格普塔认为，士兵从作战人员的视角来讲述战争，通常遵循“国家纲领、英勇与懦弱、战争的技术层面”等预设框架(Gupta: 17)，其体验、创伤和感悟与平民迥然不同，“更多关注其服役经历和创伤体验，却缺乏对人性 and 智慧的洞察力”(18)。与平民相关的作品则更多地反映了具有“激烈争议的问题和不确定性”，倾向于探讨“现实与真相的本质”和“一般公民社会的特权”等问题(18)。无论是表现军人还是平民的战争经历，文学作品都从不同侧面体现了战争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探讨战争冲击下的平民和平民眼中的战争，应该是战争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战争文学作出如下定义：战争文学以某一次或几次战争为背景，描写战争中的军人、军队和战斗，或描写受战争影响和冲击的普通人的生活，同时也关注战争对战后社会生活的影响。按照这一定义，以下文学作品都可以被归为战争文学。曲波的《林海雪原》、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和斯蒂芬·克莱恩 (Stephen Crane) 的《红色英勇勋章》都是以某一次战争为背景而展开的。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奇埃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的小说《半轮黄日》(*Half of a Yellow Sun*) 以尼日利亚内战为背景, 展现了几对平民男女在内战中的经历和遭遇, 也应属于战争文学。玛格丽特·米切尔 (Margaret Mitchell) 的小说《飘》(*Gone with the Wind*) 中的主要人物多为平民, 但刻画了美国内战给这些普通人带来的巨大冲击, 应归于战争文学之列。欧内斯特·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的《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 反映了一战对一群普通人的生活的影 响, 虽然没有直接描写一战, 也可以归于战争文学的范畴。可见, 战争文学与军事文学有着密切的关联, 但并不完全相同, 两者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用图 1.1 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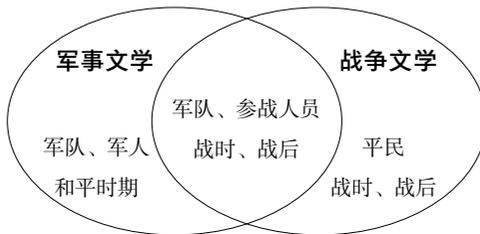


图 1.1 战争文学与军事文学

如果一部作品关注的是某一次战争中的军队和军人, 那么这部作品既是战争文学, 也是军事文学; 如果作品反映的是非战时 (和平时期) 的军队和军人, 就只能称为军事文学; 如果作品描述的是受战争影响的平民, 就只能划归于战争文学。例如, 美国作家詹姆斯·琼斯 (James Jones) 的小说《从这里到永恒》(*From Here to Eternity*) 虽然在结尾处提到了珍珠港袭击, 但描写的主要是二战前和平时期的美军生活, 展现了处于军队底层的普通士兵在美军体制中遭受的压迫, 因此可以被视为军事文学, 但不宜归于战争文学。而《巴格达的弗兰肯斯坦》描述的是伊拉克战争期间巴格

达普通平民的生活，着重展现战争对人物的影响，因此应属于战争文学。本书探讨的战争文学是指基于某一次或几次具体战争而创作的文学作品，重点揭示战争给人类和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

世界各国都有悠久和丰富的战争文学书写传统。对战争的书写既生动描绘了战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反映了人们对这一沉重话题的思考。

1.1 中国战争文学概述

中国古代战争文学中有战争诗文、边塞诗文、征戍诗文和军旅诗文的区分。与上文所说的军事文学与战争文学的区别相类似，描写边塞、征戍和军旅的诗文只有同时涉及战争场景时，才能被称为战争诗文。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约成书于春秋中期，其中已有许多描写战争的诗歌，着重描写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经历和感受，既表现了战争带给将士的荣耀和激情，也刻画了边塞士兵对家乡的思念、妻子对戍边夫君的牵挂、民众对牺牲家人的哀悼，描摹了战争带给人们的伤痛、灾难和哀伤。

《诗经》中的战争诗大多描述群体形象，个体形象较少。例如，《大雅·常武》中“王旅啍啍，如飞如翰”的王者之师气势，《小雅·采薇》中“驾彼四牡，四牡騤騤”的沙场奔腾，《秦风·无衣》中“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的豪迈和英勇，《王风·君子于役》中妻子对丈夫“君子于役，苟无饥渴”的牵挂。尽管这些描写生动形象，但主要描绘群体形象，表达群体情绪，读者“始终看不到诗中主人公的真切面目”（王福栋：12），因而难以对具体人物经历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秦汉以来，中国战争诗开始呈现出更多个人特色。这种个体化诗歌的典型代表是项羽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首有着楚辞特色的短诗生动形象地表达了西楚霸王英雄末路的感叹，既回顾了曾经的英雄豪气和功

绩，又表现了四面楚歌的悲愤和无奈，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作品在创造方面仍然处于文学不自觉的状态。“从《诗经》时代到汉代的诗歌史，都是以群体诗学为主流的诗歌史，汉为群体诗学成熟期。而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史，则转入以个体诗学为主体”（钱志熙：16）。

魏晋南北朝通常被视为真正的文学自觉时代的开始（宋雪玲：27；王福栋：21）。这一时期，人们更加重视文学自身的价值。更多作家结合自己的经历来创作战争诗文，一方面表现战争带来的灾难，一方面吟唱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的悲苦和寂寥。这些诗歌既有时代的共同特征，又展现了诗人个人的独特经历和情感体验。曹操在《蒿里行》中描写的场景正是他四处征战、目睹战争灾难的深切感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汉魏六朝的乐府诗中也有大量战争诗。《十五从军征》描写了一位“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老兵，回到家乡后，老兵看到家中凄凉景象，禁不住泪洒衣襟。《木兰诗》则描写了一名女子女扮男装从军十载的经历。木兰既有代父从军的勇气，有“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豪迈，也有“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小女儿娇羞。

在诗歌高度繁荣的唐朝，战争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唐朝的战争诗中，既有“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¹的豪情，也有“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²的悲戚。李白所作的《胡无人》描述了胡汉交战的激烈场面：“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嫫姚”；同时表达了诗人希望国家昌盛的愿望：“胡无人，汉道昌。”全诗豪迈壮阔，展现了李白奔放飘逸的诗风。杜甫则对连年战事提出质疑：“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

1 语出王翰《凉州词二首·其一》。

2 语出陈陶《陇西行四首·其二》。

意未已。”¹他的“三吏三别”生动表达了对战争的复杂态度。一方面，诗人描写了国家战乱频仍带来的无尽灾难和苦痛：“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²另一方面，乱世之中，诗人渴望国家能平叛战乱，重获安宁。在《潼关吏》中，杜甫表达了“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的愿望，并反复嘱咐守关将士“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这都体现了诗人对战争的积极态度。在杜甫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深明大义的新婚女子告诉夫君“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³，垂垂老者也表达了要奔赴战场的决心：“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⁴有学者指出，安史之乱前，唐朝的诗歌虽然也描述战争的苦难，但风格通常是“哀而不伤”；安史之乱后，则有了更多现实主义的沉重（王福栋：101-102）。

唐以降，描写战争的诗歌不断涌现，展现了人们在战争中的各种感受。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描摹了塞外的苍凉景象，表现了守关将士的艰苦生活和忧国情怀：“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辛弃疾的词作《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中的塞外沙场则壮阔而豪迈：“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岳飞在怒发冲冠的悲壮之中，表达了对敌人的愤怒和对国家的忧虑：“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⁵明朝倭寇猖獗，抗倭期间也涌现出许多战争诗，如戚继光的“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⁶，沈明臣的“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⁷，等等。

1 语出杜甫《兵车行》。

2 语出杜甫《无家别》。

3 语出杜甫《新婚别》。

4 语出杜甫《垂老别》。

5 语出岳飞《满江红·写怀》。

6 语出戚继光《马上作》。

7 语出沈明臣《凯歌》。

中国的战争文学不仅以诗的形式呈现，叙事类文体中也有大量的战争叙事。《山海经·大荒北经》就记述了黄帝战蚩尤的场景。

早期的中国战争文学与史学密不可分。史学文献不仅叙述了历史长河中的重大事件，还勾勒出许多栩栩如生、令人难忘的历史人物形象。从《左传》《史记》到《资治通鉴》等史书，都浓墨重彩地书写了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战争，刻画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在史学和文学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时间的流逝，市井文化逐渐兴起。宋代兴起了“话本”，即“‘说话’人演出的底本，是一种新兴的市民文学，属于白话小说”（郭预衡：490）。话本语言通俗，多从历史故事和日常生活中取材。其中，讲史的话本亦称“平话”，篇幅较长，如《大宋宣和遗事》《武王伐纣书》《三国志平话》《薛仁贵征辽事略》等。这些平话对史料进行加工，与民间传说相结合，以娱乐大众。平话不拘泥于史实，也不追随史书的宏大叙事，而是融入文学创作的想象与市井文化的生活气息。两宋时期有关民族战争的平话在“宋元诗文、元明杂剧、明清小说、笔记稗抄、戏曲说唱等文学文本和民间曲艺”中不断演变，表现了不同时代人们的民族意识（张春晓：231）。

元末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长篇章回体小说相继问世，代表着我国叙事类战争文学的逐渐成熟。《三国演义》可以说“是一部基于正史基础之上的历史传奇小说”，而与它几乎同时出现的《水浒传》“则是一部更多地基于野史之上的英雄传奇小说”（黄茂文：30）。这些作品或描写帝王将相的豪迈征战，或讲述草莽英雄的揭竿起义，展现出史诗般战争的宏大和民间传奇故事的悲壮。明清时期还出现了大量历史演义小说，例如，《杨家府演义》和《说岳全传》等小说已经开始通过战争书写，表现出对民族问题的忧患意识。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文学作品纷纷涌现，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吴强的《红日》、刘

流的《烈火金刚》、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等。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后也涌现出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这样的优秀战争文学作品。当下，我国的战争文学作品以聚焦和平时期的军旅文学为主，但也有《亮剑》等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

中国少数民族也不乏优秀的战争文学作品。其中《格萨尔》是流传于中国青藏高原的活史诗，在藏族古代神话、传说、诗歌和谚语等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学界一般认为这部史诗产生于古代藏族氏族社会开始瓦解、奴隶政权逐渐形成的时期。公元十世纪至十二世纪初，也就是藏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过渡的时期，《格萨尔》得到了广泛流传，并逐渐有了手抄本。它讲述了格萨尔王降临人间后降魔除妖，在各部落中征战，最后回到天国的故事。《格萨尔》通过展现藏民族在艰苦环境中的战争和生活，一方面表现了藏民族英勇善战的尚武精神，另一方面体现出藏民族推崇宽容仁爱的和善精神。

1.2 西方战争文学概述

在西方，战争是文学的重要主题。古希腊文学可以说是所有西方文学的源头。《荷马史诗》生动反映了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八世纪的希腊社会。其中《伊利亚特》(*The Iliad*)主要描写特洛伊战争期间希腊军队与特洛伊守军十年的征战；《奥德赛》(*The Odyssey*)则描述了特洛伊沦陷后，奥德修斯(Odysseus)返回家乡的历程。《荷马史诗》汇集了古希腊神话与传说，形象地展现了古希腊时期人们对战争和英雄的歌颂。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被称为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战争是常见的背景和主题。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波斯人》(*The Persians*)、《七将攻忒拜》(*The Seven Against Thebes*)、《阿伽门农》(*Agamemnon*)之中都有

对战争的描述。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Antigone*)生动描写了战争带来的灾难和伦理困境。欧里庇得斯在剧作《特洛伊妇女》(*The Trojan Women*)和《埃勒克特拉》(*Electra*)中表达了对战争的痛恨。

与古代中国的情况类似,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很多史书本身就是优秀的战争文学作品。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的《高卢战记》(*The Gallic Wars*)、阿里安(Arrian)的《亚历山大远征记》(*The Campaigns of Alexander*)和阿庇安(Appianus)的《罗马史》(*Roman History*)都流传至今,是了解历史与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战争一直是英国文学作品中的重要话题。英国文学始于歌唱英雄的史诗《贝奥武甫》(*Beowulf*),这部作品通过讲述战争中民族英雄的英勇事迹,颂扬了责任、勇气、荣誉等民族的核心精神。世界文学巨擘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著名悲剧《麦克白》(*Macbeth*)、《李尔王》(*King Lear*)和《裘力斯·凯撒》(*Julius Caesar*)都对残酷的战争场景进行了描写,其历史剧更是生动展现了英国历史,尤其是英法百年战争的风云。通过对战争的描述,莎士比亚也表达了对理想国家、理想君主和王权的构想。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三大史诗——《失乐园》(*Paradise Lost*)、《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和《斗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以《圣经》故事为背景,通过描述撒旦(Satan)和参孙(Samson)的抗争,表达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革命的乐观态度。英国历史上的历次战争,如拿破仑战争、印度兵变、克里米亚战争、布尔战争等,都成为英国作家笔下常见的题材。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简·奥斯汀(Jane Austen)、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T. S. 艾略特(T. S. Eliot)、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等作家都创作过以战争为背景的作品。

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也是英国作家描绘的重点。现代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的《雅各的房间》(*Jacob's Room*) 和《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 展现了一战对英国社会的影响。诗人威斯坦·休·奥登 (Wystan Hugh Auden) 写下了大量反映战争的诗作。在当代, 帕特·巴克 (Pat Barker) 的前后两个战争三部曲、伊夫林·沃 (Evelyn Waugh) 的“荣誉之剑三部曲”、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 (Kazuo Ishiguro) 的《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 等作品都对战争进行了深刻反思。

美国战争文学同样丰富多彩。詹姆斯·库柏 (James Cooper) 的《间谍》(*The Spy*) 被称为第一部美国战争小说, 对独立战争进行了完全浪漫化的描写。此后库柏还创作了反映印第安人战争的《最后的莫希干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肯尼思·罗伯茨 (Kenneth Roberts) 的小说《武装的暴民》(*Rabble in Arms*) 则对独立战争进行了完全负面的描写。梅尔维尔的《水手比利·巴德》(*Billy Budd, Sailor*) 生动展现了在战争的特殊时期对秩序、正义和公正的严肃思考。

美国内战是美国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次战争, 成为大量小说的主题, 如克莱恩的《红色英勇勋章》、安布罗斯·比尔斯 (Ambrose Bierce) 的短篇小说集《在生活之中: 士兵与平民的故事》(*In the Midst of Life: Tales of Soldiers and Civilians*)、米切尔的《飘》、查尔斯·弗雷泽 (Charles Frazier) 的《冷山》(*Cold Mountain*) 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现代主义文学在美国文坛蓬勃发展, 大量优秀的战争小说也随之诞生。约翰·多斯·帕索斯 (John Dos Passos) 的《三个士兵》(*Three Soldiers*)、海明威的《永别了, 武器》、薇拉·凯瑟 (Willa Cather) 的《我们的一员》(*One of Ours*) 都生动表现了战争的残酷、肮脏以及带给普通人的深重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被美国视为正义之战, 成为许多作品的主题, 如诺曼·梅勒 (Norman Mailer) 的《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 欧文·肖 (Irwin Shaw) 的

《幼狮》(*The Young Lions*), 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的《凯恩舰哗变》(*The Caine Mutiny*)、《战争风云》(*The Winds of War*)、《战争与回忆》(*War and Remembrance*), 琼斯的《细细的红线》(*The Thin Red Line*)等。这些作品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对二战进行了生动的描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的《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和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five*)则通过黑色幽默的手法,将美国战争文学带入后现代主义时期。这一时期,越南战争的残酷和失败给美国人造成巨大冲击,越战文学一方面体现了战争的残酷,另一方面表现了人们对战争性质和美国发动战争是否正义的反思。这其中不乏优秀作品,如蒂姆·奥布莱恩(Tim O'Brien)的《追寻卡西艾托》和《士兵的重负》(*The Things They Carried*)、拉里·海涅曼(Larry Heinemann)的《帕科的故事》(*Paco's Story*)、丹尼斯·约翰逊(Denis Johnson)的《烟树》(*Tree of Smoke*)等。

二十一世纪初的“9·11”恐怖袭击使得美国社会陷入一片混乱。很多作家通过作品对恐怖主义展开思考,如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恐怖分子》(*Terrorist*)、唐·德里罗(Don DeLillo)的《坠落的人》(*Falling Man*)、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的《放血尖端》(*Bleeding Edge*)、乔纳森·萨福兰·弗尔(Jonathan Safran Foer)的《特别响,非常近》(*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科伦·麦凯恩(Colum McCann)的《转吧,这伟大的世界》(*Let the Great World Spin*)。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也涌现出许多作品,如凯文·鲍尔斯(Kevin Powers)的《黄鸟》(*The Yellow Birds*)、本·方登(Ben Fountain)的《漫长的中场休息》(*Billy Lynn's Long Halftime Walk*)、菲尔·克莱(Phil Klay)的《重新派遣》(*Redeployment*)等。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展现了美国人对自我和国家的认识。

俄罗斯战争文学恢宏壮丽,描绘的“‘战争图景’和‘战争形象’在

思想、文化、意识和伦理层面刻下了深深的印痕，战争文学的叙事范畴囊括了俄罗斯民族全部的历史内涵和时代因素”（冯玉芝、杨淑华：98）。基辅罗斯时期就有大量关于民间英雄的叙事。古代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The Song of Igor's Campaign*）主要记载了十二世纪罗斯王公伊戈尔一次失败的征战，“以全景回忆展开并容纳进全民族的整个灵魂和精神”（99），也被称为“俄罗斯战争文学的开山之作”（郝葵：234）。此外，《奥列格远征王城》（*Prince Oleg's Trip to Byzantium*）、《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传》（*Life of Alexander Nevsky*）、《顿河彼岸之战》（*The Battle Beyond the Don*）等作品也都记载了古代罗斯王公们英勇征战的故事。

十七世纪以来，俄国与土耳其、法国等国之间多次爆发战争，这也成为文学作品表现的重要主题。亚历山大·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在小说《上尉的女儿》（*The Captain's Daughter*），叙事诗《高加索俘虏》（*The Prisoner of the Caucasus*）、《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The Fountain of Bakhchisaray*）和《阿尔祖旅行记》（*A Journey to Arzrum*）等作品中，描写了叶米里扬·普加乔夫（Yemelyan Pugachev）领导的农民起义和高加索战争。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Mikhail Yuryevich Lermontov）的《伊斯梅尔—贝》（*Ismail-Bey*）、《当代英雄》（*A Hero of Our Time*）以及《瓦列里克》（*Valerik*）等作品也描述了高加索战争（刘亚丁：31）。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如史诗般波澜壮阔，反映了1812年俄国对抗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展现了俄罗斯人对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的追求，以及托尔斯泰对战争行为的伦理、历史的法则与责任、人们面临死亡时对生命的认识等问题的思考（何怀宏：5）。

二十世纪初，米哈伊尔·肖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的《静静的顿河》（*And Quiet Flows the Don*）反映了顿河地区哥萨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期间的艰难生活。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的《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通过俄国的

两次革命表现了战争无情的摧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大量卫国战争文学作品纷纷出现，讴歌俄罗斯人民面对强敌的坚韧不屈、英勇智慧和爱国情怀，包括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Konstantin Simonov) 的《日日夜夜》(*Days and Nights*)、亚历山大·法捷耶夫 (Alexander Fadeyev) 的《青年近卫军》(*The Young Guard*)、亚历山大·查科夫斯基 (Alexander Chakovsky) 的《围困》(*The Blockade*)、鲍里斯·瓦西里耶夫 (Boris Vasilyev) 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The Dawns Here Are Quiet*)、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The Fate of a Man*) 等。在当代，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 以非虚构访谈的形式，深度真实地呈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阿富汗战争的残酷和荒谬，揭示战争给参与者、见证者和他们的亲人带来的巨大创伤。她的作品包括《战争中沒有女性》(*The Unwomanly Face of War: An Oral History of Women in World War II*)，又译为《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我还是想你，妈妈》(*Last Witnesse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Children of World War II*)、《锌皮娃娃兵：阿富汗战争中的苏联声音》(*Zinky Boys: Soviet Voices from the Afghanistan War*) 等。因其“多声部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转引自李春雨：59)，阿列克谢耶维奇于20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法国也不乏描述战争的文学作品。中世纪史诗《罗兰之歌》(*The Song of Roland*) 记述了查理大帝 (Charlemagne) 的侄儿罗兰 (Roland) 在出兵西班牙、征讨摩尔人的过程中英勇奋战，最终牺牲的故事。虽然故事发生在八世纪，但这部史诗更多地折射了史诗成文的十一、十二世纪法国的时代精神和特征。弗朗索瓦·拉伯雷 (François Rabelais) 在十六世纪创作了《巨人传》(*Gargantua and Pantagruel*)，展现几代巨人与邻国之间发生的战争，表达了对侵略战争的批判。古典主义时期的剧作家皮埃尔·高乃依 (Pierre Corneille) 将西班牙史诗《熙德之歌》(*The Song of the Cid*) 改编为剧作《熙德》(*The Cid*)，该剧描绘了激烈的战争场景，

充分展现了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让·拉辛(Jean Racine)的著名剧作《昂朵马格》(*Andromaque*)表现了残酷战争中母爱的崇高。

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九三年》(*Ninety-Three*)和《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分别以1793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为背景,描写战争背景下法国人的伤痛和生活。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的成名作《舒昂党人》(*The Chouans*)被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The Human Comedy*)第十三卷,属“风俗研究·军旅生活场景”。这部作品以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和拿破仑共和国之间的战争为背景,对舒昂党叛乱期间的军队进行了生动描绘。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出版于1892年的小说《崩溃》(*The Debacle*)描写了普法战争时期的社会,试图分析法军战败的原因,并批评了战时法国军队和政府的行为。当代法国也有许多作品描写战争,其中克劳德·西蒙(Claude Simon)的小说《弗兰德公路》(*The Flanders Road*)和《农事诗》(*The Georgics*)分别以二战中法军被德军击败后的撤退和西班牙内战为背景。

战争更是德国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德语史诗《尼伯龙根之歌》(*The Song of the Nibelungs*)描述了古代勃艮第王国与匈奴王国之间的战争,即克里姆希尔特(Kriemhild)的复仇之战。史诗约创作于公元八世纪末,现在的通行版本大约创作于1200年,生动反映了日耳曼民族因强烈的不安全感而发展起来的战争文化;这样的战争文化体现为对勇猛品质的强调,军队强烈的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突袭的作战方式以及毁灭一切、极具破坏性地结束战争的方式(李钊:90-92)。

德国作家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的剧作《奥尔良姑娘》(*The Maid of Orleans*)和《威廉·退尔》(*Wilhelm Tell*)取材于历史故事,歌颂了外敌入侵时人民的英勇反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通过士兵保罗·博伊默尔(Paul Baumer)的一战经历,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和对人类的摧残,成为一战反战小说的代表作。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的长篇小说《铁皮鼓》(*The Tin Drum*)和西格弗里德·伦

茨 (Siegfried Lenz) 的《德语课》(*The German Lesson*) 则对德国的二战经历和“忠于职守”等“德意志品质”进行了深入反思和探讨。

西班牙有悠久的战争书写传统。史诗《熙德之歌》约成书于公元十二世纪，记述了十一世纪西班牙民族英雄罗德里戈·迪亚兹·德·比瓦尔 (Rodrigo Díaz de Vivar) 的赫赫战功，展现了西班牙人的民族精神。塞万提斯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在十七世纪初发表小说《堂吉珂德》(*Don Quixote*)，通过主人公荒诞离奇的冒险经历，展现了西班牙发动的一系列战争的残酷。

西班牙内战是西班牙近代最为惨烈的战争，最终西班牙第二共和国解体，随后近四十年西班牙处于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Francisco Franco) 的独裁统治之下，留给人们许多痛苦的回忆。1975年佛朗哥逝世以来，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的优秀作品包括玛利亚·杜埃尼亚斯 (María Dueñas) 的《时间的针脚》(*The Time in Between*)、哈维尔·塞卡斯 (Javier Cercas) 的《萨拉米的士兵》(*Soldiers of Salamis*) 等。流亡国外的西班牙作家也是内战文学创作的主力军。西班牙裔法国女作家莉迪·萨尔维尔 (Lydie Salvayre) 的小说《不哭》(*Cry, Mother Spain*) 描写了这场迫使她的父母背井离乡战争，萨尔维尔于2014年荣获龚古尔文学奖。

其他欧洲国家也在文学作品中战争进行了书写。1874年，意大利作家拉法埃洛·乔万尼奥里 (Raffaello Giovagnoli) 发表长篇小说《斯巴达克斯》(*Spartacus*)，描述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奴隶反抗压迫的起义，颂扬了人们追求社会公平与平等的斗争。比利时作家雨果·克劳斯 (Hugo Claus) 的《比利时的哀愁》(*The Sorrow of Belgium*) 和波兰作家维拉德斯娄·斯普尔曼 (Wladyslaw Szpilman) 的《钢琴家》(*The Pianist*) 都描写了人们在二战期间遭受的苦难和对自由的追求。

澳大利亚作家托马斯·基尼利 (Thomas Keneally) 的小说《辛德勒名单》(*Schindler's List*) 以纪实的手法，记录了二战时德国商人辛德

勒(Schindler)冒着生命危险,倾注所有财力和智慧,将一千多名犹太人救出集中营的真实故事,凸显了普通人的人性光辉。马克斯·苏萨克(Markus Zusak)的《偷书贼》(*The Book Thief*)描写了小女孩莉赛尔·梅明格(Liesel Meminger)在纳粹时期通过偷书、读书,帮助自己、周围的犹太人和邻居们度过那段艰难的日子,展现了死神笼罩下的战争时期人们的艰苦生活和坚韧意志。

南美作家对战争的描写同样丰富多彩。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描写了加勒比海沿岸的小镇马孔多的百年兴衰,战争也是小镇生活和历史的重要部分。马尔克斯的另一部小说《迷宫中的将军》(*The General in His Labyrinth*)生动描写了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领袖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与西班牙皇家军队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战斗。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用西班牙语创作小说《世界末日之战》(*The War of the End of the World*),描写十九世纪末巴西的卡努杜斯农民起义事件,表现了起义农民为争取自由与平等而付出的努力和牺牲。

1.3 亚非战争文学概述

西方文学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呈现出战争的方方面面,亚非文学殿堂里同样有无数优秀的战争文学作品。在中国学界,“亚非文学”常与“东方文学”这一概念相通。“东方文学”通常指亚洲文学与非洲文学,“包括埃及文学、巴比伦文学、希伯来文学、印度文学、波斯—伊朗文学、阿拉伯文学、越南文学、朝鲜—韩国文学、日本文学、印度尼西亚文学和当代非洲文学”(张思齐:137)。但也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东方可能并不包含非洲。为了避免概念混淆,本书采用“亚非文学”这一概念。

亚洲各民族有着悠久的战争书写传统。战争文学生动展现了战争在各民族历史与生活中的重要影响，是了解亚洲各国历史与文化的重要窗口。

目前世界已知最古老的英雄史诗是四千多年前在苏美尔人中流传的《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史诗以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乌鲁克王国为背景，记录了国王吉尔伽美什(Gilgamesh)的征战生涯和丰功伟绩，他在好友恩奇都(Enkidu)的帮助下，由暴君成长为为民除害的英雄。史诗表达了人们对英雄的崇拜和赞美之情。

《圣经》最早由希伯来文写成，其中体现出战争对人类的影响。在《旧约》中，由上帝发起或支持的战争都是正义战争，这也成为后来西方正义战争学说的起源。《新约》中更不乏隐喻意义的战争，例如，信徒与魔鬼之间的战争实则为人類的灵魂之战和善恶之战。

“阿拉伯是一个诗歌的民族”(仲跻昆: 19)。在贾希利叶时期、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由于阿拉伯世界战争频仍、兵祸不断，阿拉伯诗人创作了大量诗作，描绘了部落和民族的征战，歌颂战斗英雄及其光辉功绩，感叹战争带给人们的痛苦。这一时期阿拉伯诗歌的杰出代表是“悬诗”，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将其诗集称为“抒情而兼叙事的英雄歌集”(黑格尔, 1996: 172)。从阿拔斯王朝开始，阿拉伯文学开始走向民间，《一千零一夜》(*Tales from 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中也有对战争的描述。在随后的马穆鲁克王朝，《安塔拉传奇》(*The Legend of Antara*)、《拜伯尔斯传奇》(*Sirat Al-Malik Al-Zahir Baybars Hasab*)等讲述阿拉伯—伊斯兰英雄人物的民间故事也开始流传并定型。其中《安塔拉传奇》可与《荷马史诗》齐名，描述了英雄安塔拉(Antara)行侠仗义、转战南北、击退敌人的英勇经历，是“一部土生土长的纯粹歌颂阿拉伯本民族英雄的史诗式作品”(仲跻昆: 536)，在阿拉伯地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二十世纪以来，阿拉伯文学中有很多作品反映了阿拉伯人民在殖民主义和战乱蹂躏下的痛苦和挣扎。埃及作家纳吉布·迈哈富兹(Naguib

Mahfouz)创作的《宫间街》(*Palace Walk*)、《思宫街》(*Palace of Desire*)和《甘露街》(*Sugar Street*)三部曲通过二十世纪前半叶开罗一个商人家族的三代传奇,既生动刻画了当时埃及的社会风貌,又展现了埃及人民反帝爱国的民族斗争,迈哈富兹也于1988年成为阿拉伯文学界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伊拉克当代作家萨达维在小说《巴格达的弗兰肯斯坦》中描写了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当地人民在生活和情感上遭遇的巨大磨难。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等国也有大量作品反映当地人民反殖民主义的艰苦斗争。

伊朗最古老的文献是诗歌经典《阿维斯塔》(*Avesta,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Parsis*),其成书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十世纪。其中的第十四编名为“巴赫拉姆·亚什特”,意即“战争与胜利之神颂”,其中通过描写神与恶魔之间的战争,歌颂了光明和善良。长篇叙事诗《缅怀扎里尔》(*Memorial of Zareran*)创作于公元五至六世纪,讲述了伊朗统帅扎里尔(Zareran)英勇杀敌,为国牺牲的传说故事。伊朗诗人菲尔多西(Abolqasem Ferdowsi)根据波斯的民间故事,创作了神话民族英雄史诗《列王纪》(*Shahnameh: The Persian Book of Kings*,也称《王书》),从人类初始写到651年萨珊王朝灭亡时止,共叙述了波斯历史上五十个帝王公侯的生平事迹。《列王纪》一方面反对异族的侵略与统治,一方面歌颂忠于民族、为国尽忠的勇士和英雄,生动反映了波斯人民对战争的态度。

日本有着悠久的战争文学传统。日本第一部文学作品《古事记》成书于712年,包含了日本古代神话、传说、歌谣、历史故事等,其中描写了天皇和皇族为维护统治而进行的战争。成书于奈良时代的《日本书纪》形式上仿效《汉纪》《后汉纪》等编年体中国史书,以史实为主,记录了日本历史上的多次战争。日本第一部诗歌总集《万叶集》收录了4500余首创作于四世纪至八世纪中叶的长短和歌,其中收录了一百首左右由戍边将士或其家人创作的防人歌。防人歌与中国的边塞诗有许多

相似之处，“共同的战争背景和战患危机使边塞诗和防人歌之间存在很多源于历史和民族性的不同点，亦有许多源于人性的共同点”（孙静冉：163）。

日本的物语文学产生于公元十世纪的平安时代。随着日本封建社会武士阶级的兴起，文学上出现了以《平家物语》为代表的战记物语；这部作品通过描写平氏家族的兴衰和源氏、平氏两大武士家族集团的大战，展示了封建主义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变革。有学者指出：《源氏物语》与《平家物语》并列为日本古典文学双璧，一文一武，一个象征“菊花”，一个象征“刀剑”（宋成魏：160）。战记物语使日本古典文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成为日本叙事文学的基础，此后《太平记》《义经记》《难波战记》等战记物语相继出现，丰富了日本古代叙事战争文学。

江户时代，日本开始出现“读本”小说。曲亭马琴的《高尾船字文》和山东京传的《忠臣水浒传》都改编自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在描写战争时注重结合日本文化和武士阶层的审美，创造了“演义体史传”这种新的小说形式。曲亭马琴被称作“‘读本’小说的第一代表”（魏大海：23）。

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进入现代化进程，推行工业化变革，国力大幅提升，其扩张之心也逐渐显露。纵观近代日本文学史，“可以说日本的近代文学和‘战争’（战争文学）是共同发展的”（黑古一夫：75）。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催生了许多文学作品，既有鼓舞斗志和士气的作品，也有反战作品，其中森鸥外、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黑岛传治、与谢野晶子等作家的作品有较大影响。

从1931年入侵中国到1945年战败，“日本文学在战争体制下处于最黑暗的时期。其间，反对战争的文学作品声音微弱，美化、歌颂侵略战争的作品充斥着各种媒体”（何建军，2008：4）。日本作家在这一时期为协助战争而创作的文学被称为“国策文学”。日本征用了许多作家，迫使他们加入“笔部队”，专门写作美化侵华日军暴行的作品。与此同时，日

本民间也有反对战争的声音和作品，但因局势所限，大多在战后才逐渐发表。

二战以后，日本一大批具有“战后”特质的作家崭露头角，创作了许多与战争主题相关的作品，被称为“战后派作家”。这些作家当中有很多人以普通士兵或“笔部队”征用作家的身份亲自参加了二战，对战争有直接的个人体验，同时又深受日本战后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对二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亮》、梅崎春生的《樱岛》、大冈升平的《野火》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日本战后派战争文学主要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描写战争的残酷以及带给普通民众的心理创伤。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反战、厌战的思想意识”（何建军，2007：110）。同时，“原爆文学”也逐渐兴起，主要描绘原子弹爆炸给日本带来的巨大灾难和人们的反思。

朝鲜有着悠久的战争文学传统。十六世纪中叶，朝鲜兴起学唐诗风；西山大师的《过王将军墓》和李安讷的《从军行》等诗作描写战争与军人生活，表达了爱国主义的情怀。高丽时期，杂文文体“稗说文学”形成，并进而促进了小说的产生。许筠熟读《水浒传》，创作了小说《洪吉童传》，讲述朝鲜传说中的古代英雄洪吉童揭竿起义、劫富济贫的故事；《洪吉童传》是朝鲜最早由文人独立创作的母语小说，对朝鲜后世小说创作有巨大影响。此后，反映壬辰战争的《壬辰录》和反映丙子战争的《朴氏夫人传》《林庆业传》等作品，都塑造了一系列抗击外敌的爱国人物形象。二十世纪以来，连续的战争给朝鲜半岛带来了巨大灾难和深远影响，催生了大量文学作品，其中有的颂扬战争中的爱国热情，有的表现战争带来的伤痛和灾难。

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是印度古代神话、英雄传说和历史故事的总汇。两部史诗通过刻画英雄人物在战争中的传奇故事和英勇事迹，对印度民族精神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两部史诗也对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的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十九世纪印度沦为英国殖民

地，二战后才获得独立，但随后的印巴分治却带来诸多冲突和战争。现当代印度作家创作了大量描写印巴分治冲突的文学作品，表现了当代印度的社会矛盾。

泰国史诗《拉玛坚》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基础上派生而来，增加了许多泰国文化的元素，讲述天王拉玛与妻子的悲欢离合以及与恶魔托萨堪的大战。泰国著名诗人顺吞蒲创作了长篇叙事诗《帕阿派玛尼》，主要叙述拉达纳国的王子帕阿派玛尼与锡兰国王子和公主多次交战的故事，探讨了惩罚与复仇的主题。

梁立基在《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中指出，“印度尼西亚文学是产生在印度尼西亚领域内的从古至今的所有文学，是由过去的各族语文学（其中以爪哇古典文学和马来古典文学最发达和最有代表性）和现代的印度尼西亚语文学所组成”（梁立基：803）。印度尼西亚的早期战争文学同样深受印度两大史诗的影响。作家们根据史诗的格律，创立了“格卡温”诗体；这类作品中，甘瓦（Mpu Kanwa）的《阿周那的姻缘》（*The Marriage of Arjuna*）、塞达（Mpu Sedah）和巴努鲁（Mpu Panulu）的《婆罗多大战记》（*The Wars of the Bharatas*）都有对战争的生动描写。十七世纪的传奇小说《杭·杜亚传》（*The Adventures of Hang Tuah*）通过马来英雄杭·杜亚（Hang Tuah）抵御外敌、维护马来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的故事，表现了马来人的优秀民族精神。当代著名小说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Ananta Toer）的《游击队之家》（*Guerrilla Family*）和《铁锤大叔》（*Father Hammer*）也反映了印尼人抗击外敌时的英勇。

越南很早就出现了反映战争的文学作品。十八世纪，越南诗人邓陈琨的汉文长诗《征妇吟》通过描写当时郑、阮两大封建集团的内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表达了对非正义战争的痛恨之情，至今被誉为“千古绝唱”（余富兆，1999：22）。十九世纪，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阮庭炤、潘佩珠等诗人用文学作品表达了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越南的革命文学蓬勃发展，出现了黎文献的《昆嵩监狱》、旧金山的《越

狱》、胡志明的《狱中日记》等作品。1945年至1975年间的抗法、抗美过程中，越南涌现出大量抗战文学，“歌颂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余富兆，2006：112）。之后也有如保宁的《战争哀歌》这样对战争进行反思的优秀作品。

战争也是非洲各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来自乌干达的作家莫妮卡·阿克·德尼科（Monica Arac de Nyeko）认为：“作为一名非洲文学的写作者，如果你的主题不是关于战争或是饥荒的话，人们就会质疑你作品的真实性。”¹非洲文学丰富多彩，但战争显然是非洲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从十五世纪开始，西方各国开始入侵非洲；到十九世纪，非洲已沦为欧美各国的殖民地，非洲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二十世纪，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开展，越来越多的非洲作家开始意识到讲述非洲故事的迫切性，他们想让世界听到：“这是非洲人的想法——对今天的非洲来说，只有非洲人的想法才最关重要”（吉卡鲁，“前言”：3）。许多非洲文学作品描写了战争带给非洲的灾难，以及非洲人民为自由和独立作出的艰苦努力。

尼日利亚的几位重要作家都在作品中对战争进行了描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的《森林之舞》（*A Dance of the Forests*）和《疯子与专家》（*Madmen and Specialists*）呈现了尼日利亚历史中的战争、苦难和人们的不懈探索。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被誉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他的作品《曾经有一个国家：有关比尔弗拉内战的个人回忆录》（*There Was a Country: A Personal History of Biafra*）便是以1967年至1970年的尼日利亚内战为背景创作的回忆录，这部作品对人类的暴力和战争爆发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女作家阿迪奇埃的小说《半轮黄日》也以尼日利亚内战为背景，探讨了民族、种族、殖民主义、正义和道德等重要论题。

1 转引自Mahey, Crystal. “非洲文学只能表现战争和饥荒吗”，2007.<http://qnck.cyol.com/content/2007-07/21/content_1834024.htm>(accessed 15/11/2019)。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肯尼亚爆发了反对英国殖民者强占土地的武装“茅茅运动”，该运动成为许多作家的书写对象。莫加·吉卡鲁（Muga Gicaru）的《阳光照耀大地：茅茅起义前怯尼亚¹的生活片断》（*Land of Sunshine: Scenes of Life in Kenya Before Mau Mau*）、R. 穆戈·盖瑟汝（R. Mugo Gatheru）的《两个世界的孩子》（*Child of Two Worlds*）、梅加·姆旺吉（Meja Mwangi）的长篇小说《喂狗的尸体》（*Carcase for Hounds*）和《死的滋味》（*Taste of Death*）等作品都描写了当地人民为自由和土地的英勇战斗（汪琳、王璐月：125）。肯尼亚的第一任总统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创作了《我的吉库尤人民——温戈姆贝酋长传》（*My People of Kikuyu, and, the Life of Chief Wangombe*），描写吉库尤人民在遭受殖民者无尽的剥削的过程中，认识到“不要用武器而用‘外交’和‘智慧’对付欧洲侵略者”（姜晓春：5）。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的《孩子，你别哭》（*Weep Not, Child*）、《大河两岸》（*The River Between*）和《一粒麦种》（*A Grain of Wheat*）等作品表现了肯尼亚人民在殖民与战争中的遭遇以及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英勇作战。

津巴布韦的一些黑人作家“以历史小说的形式表现了对殖民制度批判、为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战、为自身的文化身份而抗争的共同主题”（汪琳、方圆：77）。斯坦莱克·萨姆坎戈（Stanlake Samkange）的《我为我的国家受审》（*On Trial for My Country*）、《被哀悼者》（*The Mourned One*）和《起义的岁月》（*Year of the Uprising*）都表现了津巴布韦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战旗：津巴布韦诗选》也收录了许多与战斗相关的诗歌，诗人们呼吁津巴布韦人民为民族解放和独立而英勇战斗。

塞内加尔第一任总统利奥波德·塞达·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不仅提出了“黑人性”（*négritude*）这一在黑人文学中产生重要影

1 即肯尼亚。

响的概念，还创作了诗集《黑色的祭品》(*Hosties Noires/Black Offerings*)，揭露侵略战争给非洲士兵带来的灾难，对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进行了谴责(何乃英：67)。南非女作家奥莉芙·席莱纳(Olive Schreiner)的《马绍纳兰的骑兵彼得·海尔凯特》(*Trooper Peter Halket of Mashonaland*)通过一名普通英国士兵的故事，披露了英国殖民军队对南非当地人的种族灭绝罪行。南非白人女作家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在小说《七月的人民》(*July's People*)中，通过描绘将来可能爆发的南非黑人革命，来想象白人需要依附黑人生活时的情景，从而说明种族歧视对黑人与白人的深远影响。

许多有着强烈种族意识和黑人意识的作家选择用非洲本土语言——斯瓦希里语进行创作。坦桑尼亚诗人夏班·罗伯特(Shaaban Robert)是用斯瓦希里语创作的代表作家，被誉为“东非的莎士比亚”。“他的一生是以笔为武器，为非洲的独立、人民的自由呐喊、奋斗的一生”(冯玉培：358)。他的长诗《独立战争史诗：1939—1945》(*Utenzi wa Vita vya Uhuru: 1939 hata 1945*)呈现了非洲人视角下的二战，“在二战中成为班图人反对纳粹德国的战歌”(焦旸：212)。坦桑尼亚剧作家易卜拉欣·侯赛因(Ebrahim Hussein)也用斯瓦希里语创作，他的历史剧《齐恩杰凯迪莱》(*Kinjeketile*)反映了当地人起义反抗德国殖民者的经历。赛义德·艾哈迈德·穆罕默德(Said Ahmed Mohamed)的《当爷爷复活的时候》(*Babu Alipofufuka*)和基艾罗·沃迪·瓦米提拉(Kyallo Wadi Wamitila)的《人类!》(*Bina-Adamu!*)都反映了“日益全球化背景之下非洲的战争、饥饿、贫困的危机根源和解决途径，以及非洲经济发展困境和未来的方向”(李金剑：176)。

埃莱妮·康道莱奥蒂斯(Eleni Coundouriotis)在《人民对小说的权利：后殖民的战争小说》(*The People's Right to the Novel: War Fiction in the Postcolony*)一书中指出，非洲战争文学从根本上是“一种抗议的文类，旨在激发人民的民主理想，鼓励人们去了解历史，从而参与对历史叙述的

建构”(Coundouriotis: 263)¹。非洲战争文学作品通过对战争的书写, 描摹了非洲充满苦难的历史, 表达了非洲人民对独立平等的强烈渴望和为自由而不懈努力的坚定决心。随着非洲人民民族意识的增强, 非洲文学中的战争书写除了表达对被殖民、被掠夺历史的抗议之外, 也开始更多地展现非洲人民的主体性和他们对非洲历史叙述的建构, 这也将成为非洲战争文学的一个新特点。

1.4 战争文学研究的当代意义

战争作为世界文学的永恒主题, 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都得到了书写。对战争这一主题的深入研究, 将进一步加深我们对现代社会的了解。在《战争与社会思想: 霍布斯以降》(*War in Social Thought: Hobbes to the Present*)一书中, 德国学者汉斯·约阿斯(Hans Joas)和沃尔夫冈·克内布尔(Wolfgang Knöbl)指出, 战争是“现代的构成²要素”, 是“有重大影响的(即可以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事件”(约阿斯、克内布尔: 5)。

如果不考虑战争, 我们既无法理解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属性(而不是别的属性, 如超国家属性), 也无法理解发生在现代的各种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革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迁、权利的扩展和普遍化乃至艺术和美学领域的重大变革等现象往往与战争的影响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忽视了军事冲突对于现代性的形成和形式发挥了何种

1 文中引用部分为本书作者所译, 故参引括号内仍保留引用作品作者的原名。本书此类引用参照此做法, 不再特别说明。

2 粗体着重部分为原作者所加, 以下不再另作说明。

作用这一问题，我们在社会学分析中必将陷入盲区。(约阿斯、克内布尔：5)

世界各国文学中的战争书写记录了战争带来的灾难和苦痛，也展现了人们在战争中艰难追寻和平与美好生活的不懈努力。战争文学研究推开了一扇沉重的大门，让我们得以深入认识现代社会，探讨人类文明、历史、政治和社会发展，思考人性、伦理、道德和理想等问题。今天，战争的阴霾仍然笼罩着世界，战争仍然是人类必须面对的沉重话题，战争文学研究的当代意义也就不言而喻。

战争文学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现代战争的发动、宣传和进行与媒体之间的密切联系。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一书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安德森：5)。由于共同体成员彼此并不认识，也无从相遇，因此在民族成员对其他成员和共同体的想象中，媒体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小说与报纸是两种重要的想象形式，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26)。印刷语言和印刷资本主义奠定了民族意识的基础，“创造了和旧的行政方言不同的权力语言”(53)。而在现代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媒体或通过调动民众的爱国热情，引导民众支持战争，从而对战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或通过披露政府的失误、腐败和无能，质疑发动战争的正义性和战争的合理性，起到加速战争结束的作用。

不同时期的媒体形式也在战争中展现出不同的特点。近代以来，报刊杂志的普及使人们对战争有了全新的认识。一战时期，大量的宣传海报对人们战争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二战时期，无线电广播使远离战场的人们也能听到战火的呼啸。越南战争时期，影视节目让战争走进人们的卧室，让身在美国的后方民众也能看到战争的真实场面。而在互联网时代，

微博等自媒体更是带来信息爆炸，带来更多良莠不齐、真伪难辨的战争报道。研究战争文学如何呈现战争与媒体的关系，媒体如何引导和塑造民众对战争的态度，从而对战争的本质形成更为敏锐的认识，在当下有着重要意义。本书第三章第一节通过详细探讨影视、新闻媒体等对战争的反映，剖析媒体与民众的互动关系。

战争文学研究不仅需要关注国家的宏大叙事，还需要考察战争对个人的微观影响，这在当前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战争总是与妻离子散、背井离乡、杀戮、死亡、毁灭联系在一起，总是给个人和民族带来深重的创伤。例如，二战时期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给犹太人留下了灾难性记忆；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冲突中，平民沦为赤裸生命；当前的反恐战争中，流散身份也给人们带来焦虑和创伤。其中，许多问题都值得我们探讨，如现代战争暴力产生的根源、弥散的机制以及恐怖主义在全球蔓延的根源；人们的战争创伤与哪些因素相关；特定的文化如何为战争创伤的治愈提供解决方案；战争创伤的产生与权力、话语、身份、伦理有什么联系；等等。

这些不仅是现实中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也是战争文学着力描绘的重点。历史研究更注重宏大的史实，难以顾及历史潮流中普通个体的命运和感受。战争文学则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审视被裹挟在历史潮流中的普通人，从而提供一种更为微观但也更为深刻和真实的理解视角。大量的战争文学作品为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生动的文本和个案。通过文学作品研究战争状态下的个人，探讨个人和民族的战争记忆，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认识特定历史时期和极端条件下的个人和民族，深化对人性、勇气、道德、伦理等的理解。本书第三章第二节通过讨论美国老兵的战争创伤与身份认同的关系，探讨战争对个体的影响和冲击。

当代战争文学研究需要深入剖析被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所遮蔽的各种矛盾。正如约阿斯和克内布尔所指出的那样，战争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密切相关。一般认为，“民族”一词的现代意义到十八世纪才逐渐浮现，

而十九世纪通常被称为“‘民族创建的世纪’(nation-building)”(转引自霍布斯鲍姆:1)。在战争的特殊时期,各个国家会强调其民族国家身份,激励所有人为民族国家而战斗,从而创建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战争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到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之中。在这一宏大叙事之下,公民在民族国家框架中的其他亚身份——如种族、性别、阶级、年龄、地域等——则往往被忽略。

战争文学一方面表现民族国家战争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也细致入微地展现了人们在战争中对各自亚身份的追求。如何在战争冲突中应对民族危机与族裔矛盾?女性在战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战争如何体现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差异和矛盾?各种小共同体身份如何在民族国家宏大的战争叙事中被消解,又应该如何构建?这些都是当代战争文学研究应深入探讨的问题。本书第三章第三节通过分析美国黑人战争文学,指出美国黑人通过战争追求黑人的权利和独特身份,生动体现了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框架下不断涌动的种族矛盾。

当代战争都是高科技战争。研究战争文学所折射的科技与战争的关系,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早期的战争使用冷兵器,十七世纪以来,人们在战争中普遍使用以火炮等为代表的现代武器,这也标志着人类步入现代战争时代。在现代战争中,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科技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沃尔特·罗利(Walter Raleigh)曾专门研究过英国一战时期的皇家空军,他指出:“空战的历史与飞行艺术的发展史密不可分。战争的需求会促使并加快发明。当一个国家为生存而战时,会毫无保留地将金钱和精力投入其中”(转引自Pascoe:367)。在战争的威胁下,各国都寄希望于通过制造高科技武器装备来增加获胜的可能。但科技发展带来的并不都是战争的胜利,有时科技反而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导致更大的伤亡。如何将科技与民族文化相融合?科技是否增强了士兵在战场上的安全感?科技的运用与伦理之间有什么关系?高科技战争给生态带来了哪些危机?这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本书第三章第四节

试图分析科技与美国民族身份的关系，探讨科技在战争中的运用及其带给士兵的冲击。

战争文学丰富多彩、卷帙浩繁，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战争文学生动展现了人类与战争的复杂关系。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矛盾丛生，并且正处于新旧国际秩序交替的转型过渡期。在当下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深入研究战争文学，探讨各国的文化、政治、经济、军事、战争观、战争哲学等问题，实际上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度关切，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战争文学研究将促使我们反思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冲击，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中国学者视角下的战争文学批评。